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考古学研究

(九)

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

下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考古学研究

(九)

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

下 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文物出版社

北京

Archaeology Series, Peking University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Archaeology

(IX)

Festschrift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 Yan Wenming's 80th Birthday

B

Compiled by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Cultural Relics Press

Beijing

中原的形成

——以先秦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进为中心

段宏振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 引言：中原的概念

中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同时又更具有浓厚的人文地理意义。中原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早期阶段可追溯至先秦时代，中原一词已经见于当时的文献。《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但这里的中原均意为原野，并不具备专门指向的地理意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国语·晋语三》：“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国语·吴语》：“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很明显，这里的中原已经具备了专门指向的地理意义，即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如果以文献来看，中原概念的初步形成，至少应在春秋时期。

先秦时期，与“中原”紧密相连的还有“中国”一词。文献中的“中国”一词，最早的见于《诗经》、《尚书》之中，例如，《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而《何尊》的铭文将“中国”一词的出现年代提早至西周初年，其铭文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①上述之中国，均指京师及邻近地域，实际上已含有中原的意义。而在《左传》等文献中，中国一词已明显具有中原之义，如《左传·庄公三十一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孟子·滕文公上》：“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与中国紧密相连的还有“华夏”的概念。“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夏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①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中国即指中原，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合，自然地理意义上系指黄河中下游地域，人文地理意义上均包含有相对于边境及蛮夷戎狄而言的中央地区，综合起来的意义即指华夏族群集中居住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此乃中原的一般基本要义，而若要全面而具体说来，中原的意义则要复杂得多，不仅需要狭义和广义之横向视野，还需要动态发展之纵向角度。从地域上讲，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而广义的中原，指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邻近地区，大致包括鲁东、冀南、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其范围基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族群构成及融合发展上讲，早期的中原以早期的华夏族团为主，而后来的华夏族团则不断融合同化周边的诸多部族，随着中原地域的拓展不断膨大，位于中原周边的诸夷蛮戎狄等部族，不断被华夏蚕食消融同化为一体^①。

与中原的正式形成相应，成熟的中原概念见于秦汉时期的文献。例如，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王制》篇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这是自先秦以来关于中国或中原本质含义的最分明阐释，同时也指出了四方夷狄与中原之间的本质差别。而对于中原与四方夷狄的本质区别，自先秦时期即有深刻的认识。如《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狄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

很明显，鲜明的中原中国与四方相比较而凸显，秦汉的中国中原不仅地域分明，而且民族文化特征突出，是为成熟的成年的中原。中原的人文意义即应在此，中原的形成之路也至少由此向上追溯。中原人文地理意义的主要体现即是华夏族团的基本形成与稳定，即：核心地域的相对固定、族团人群的特征显现、文化风俗的积淀与传承、政治的表面或松散一统。如果依此标准，成熟的中原应自秦汉始。此前东周时代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是中原内部的深层次整合剧变。而再此前西周时期的表面统一，则是中原的表层整合。而再早的商王朝的强盛与文化拓展，应是中原的首次凸显与拓展。

夏商周三代，先后接替在中原表演主角，它们虽族源不同但传承的是中原的一脉文化。至东周，经过剧烈的文化整合和民族同化，夏商周乃至诸多部族于中原逐渐交融一体，成为一个更大的华夏。自夏代的天下万邦，到商周的分封，再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终至秦的一统，正是这一历程的政治反映。秦统一，最终在深层和表面上完成了中原的彻底整合。至此，中原才成人了，独立了。

商代、西周、东周应是中原的幼年期。中原在商代初定天下，于西周时期大幅度拓展，入东周时代则内部消化积淀充实，之后才有秦汉的一统整合。追溯中原的诞生，

^① 徐旭生认为，华夏、苗蛮、东夷三个族团的同化到春秋时期已经快完全成功（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夏代大概是中原的婴儿期,龙山时代则大致是中原的成熟胚胎期,或属临产前状态。更早的仰韶时代,属于中原的胚胎孕育和发育时期。

与其基本稳定的地域范围相应,历史上中原的内涵和意义也比较稳定:代表着发达的旱地农业经济,发达的青铜、铁器、瓷器和丝绸文明,发达的华夏政治和文化系统等等。历史的中原如此凸显和重要,因此有必要探究其形成的路径和动因。汇集成中原的上游支流群来自遥远的史前时代,因此考古学研究无疑是一种主要的探索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上,中原的概念具有特定的意义,具有考古学文化区域的特定含义,中原即指中原考古学文化区^①。本文试图以考古学意义为基础,并充分注意历史学方面的意义,重点探索中原文化区的出现及发展变化之演进历程,同时兼及黄土高原文化区和北方文化区等区系,以及它们之间随时代在地域范围上的此消彼长的相应变化。应当指出,从理论上讲,考古的中原与历史的中原并不能完全等同,但考古学无疑是追溯中原在史前时代形成轨迹的最好方法。换言之,本文对中原形成进程的考察方法是:从考古学意义的中原文化区,到历史意义的中原。

(二) 中原形成轨迹的考古学观察

为了在考古学上理解中原考古学文化区的地域区划,本文尝试引入黄土高原考古学大文化区和太行山东麓文化区两个概念。从某种宏观角度看,某一阶段的中原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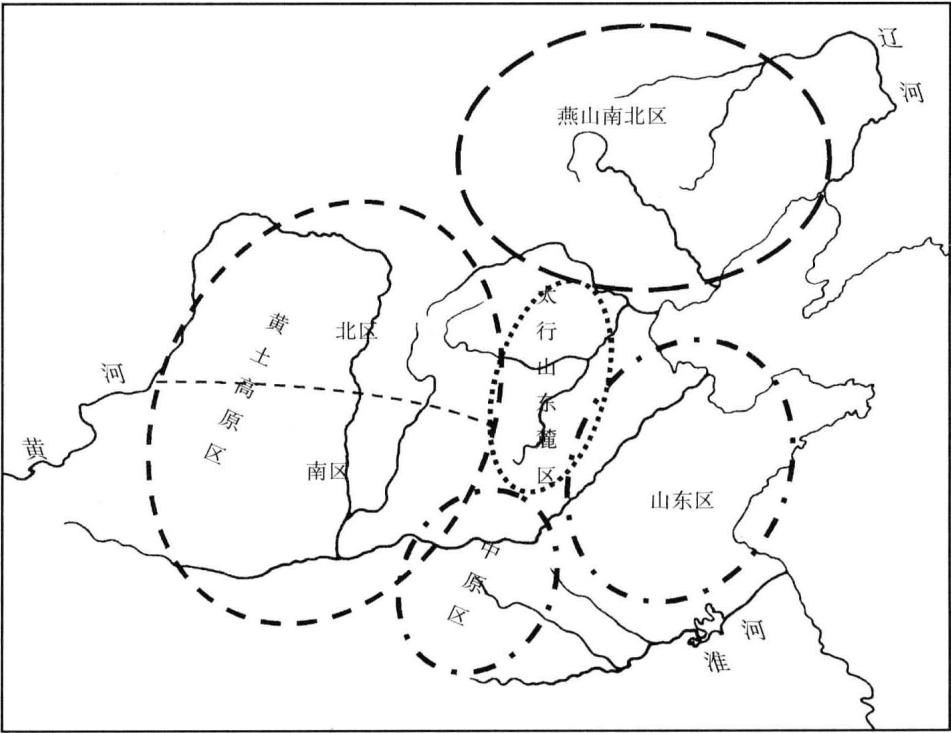
① 关于中国史前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划分,有着诸多不同的认识。苏秉琦于1981年最早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参见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后来又对这个分区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即:北方、中原、东方、东南、南方和西南。其中,关于北方区和中原区的具体表述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同时又提出,广义的北方分三大块:西北、北方和东北(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29~30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严文明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作六大区:燕辽、中原、山东、江浙、长江中游和甘青。其中,关于中原文化区的范围表述为: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全境。并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是以中原文化区为花心的重瓣花朵式向心结构。很明显将中原区的核心地位提至相当的高度(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后来,严文明在中原区系之中,又划出一个文化亚区——雁北区,亦即将陕北、内蒙古中南、晋北和冀西北地区归入广义的中原区系。这种划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区系结构的复杂层次以及分化与发展。对于从史前到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系的地位变化,严先生在该文中说,青铜时代早期,以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最为发达,一个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格局正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即认为,中原核心在二里头时期基本形成(参见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李伯谦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分区系统进行了总体研究,其中北方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的范围因时代而不断变化(参见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李学勤曾将东周时代划分为7个文化圈,其中的中原文化圈包括周和三晋地区(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过是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分化与支系。黄河的巨大回旋曲折使其与黄土高原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黄水和黄土滋润涵养了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因此，黄土高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单元，在考古学和历史学意义上也是一个大文化区，代表着黄河流域的核心古文化。

黄土高原大区又可分为北区和南区两大部分：北区即阴山以南的河曲地带及邻近地区，南区即渭河、汾河下游流域的河谷平原及邻近地区。单从地理角度看，黄土高原东侧的东缘区为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南侧的东南边缘区则为嵩山—伏牛山东麓地区。而这个东南边缘区，正是中原的发生地和基础，后来又融合了黄土高原南区。中原的文化地域概念，有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既存在着历史特定的比较固定的核心基础地域，同时其范围界限又在不断地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见图）。

- 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原文化区的发生与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1）第一中原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6000 ~ 前 5000 年的裴李岗时期，是中原胚胎的最早孕育时期，其核心地域最初出现在豫中豫东南地区。
 - （2）第二中原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5000 ~ 前 4700 年的仰韶最早阶段，是中原胚胎的初现时期。以豫中为核心的中原区得到初步的发展，核心地域范围扩大，几乎扩展至整个的黄土高原南区，南至伏牛山南麓的汉水流域。
 - （3）第三中原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4700 ~ 前 4000 年的仰韶半坡期阶段，是中原胚胎



仰韶后期的中原文化区示意图

的重组时期。关中地区的半坡类型强势向东发展，形成关中豫西晋南的尖底瓶彩陶钵文化繁荣区。相比之下，前一阶段兴盛的中原区在西方的挤压下明显向东收缩而发生结构重组。

(4) 第一黄土高原大文化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4000 ~ 前 3500 年的仰韶庙底沟期阶段，是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繁荣时期。黄土高原的南缘河谷地带文化繁荣，极力向四方辐射扩张，整个黄土高原几乎整合为一个文化区，但中原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并没有消亡，只不过是黄土高原所涵盖，披上了黄土高原的外衣。

(5) 第四中原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3500 ~ 前 2500 年的仰韶后期，亦即秦王寨期和庙底沟二期阶段，是中原胚胎挣脱黄土高原大区的重现时期。黄土高原大文化区分化和消解为三个区域：其一，北部阴山以南地区的独立性逐渐凸显，北方文化区初现；其二，南部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传统的尖底瓶钵文化再次凸显，后一阶段甗的出现是新标志器；其三，豫中豫东南地区传统的鼎罐文化在脱下黄土高原的外衣后开始复兴，中原文化区得以重现并且发展迅速，与西面的关中晋南豫西地区形成对峙。

(6) 第五中原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2500 ~ 前 2000 年的龙山时代，是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继庙底沟期之后的第二次整合和再次繁荣，即第二黄土高原大文化区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原胚胎的凸显与稳固时期。以豫中豫东南为核心的中原与黄土高原的区别愈来愈大，以鼎罐瓮文化为特征的独特性分明凸显。而黄土高原的主要地区，即阴山以南地区和关中豫西晋南地区的统一性比较显现，逐渐整合成为甗鬲文化区，并开始强烈向四方辐射，黄土高原东缘与东南缘的丘陵及山前平原为主要的的影响接受区。

(7) 第六中原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2000 ~ 前 1600 年的夏代，是中原初步形成的婴儿时代。二里头文化西拓进入豫西晋南，最终成为中原舞台的主角。中原的核心区域自此几乎定格在黄土高原南缘和东南缘的河谷及山前平原地带。

(8) 第七中原区时期，约在公元前 1600 年至前 11 世纪的商代，是中原的初次繁荣及拓展时期。中原区扩大几乎占据黄河中下游流域，进入幼年时代。

(9) 第八中原区时期，公元前 11 世纪 ~ 前 771 年的西周，是中原大文化区的形成与巩固时期。西周的分封使得中原继续拓展，影响所及北至燕山，南达长江流域。中原在表层得到大面积的整合。

(10) 第九中原区时期，公元前 770 ~ 前 256 年的东周，是中原的沉淀与固化时期，中原在深层次得到结构性的整合。

(11) 第十中原区时期，公元前 221 ~ 公元 1127 年，秦帝国到宋帝国，是中原的永恒与隐形时期。

纵观中原文化区的出现及发展演进历程，其核心虽一直位于豫中地区，然而地域范围始终是发展的动态的，其位置与作用也是起伏变化的，但总的趋势是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位置作用不断稳固提升（见表）。

中原文化区形成与发展演进历程示意图

时 代 \ 分 区		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区		黄土高原大文化区		燕山南北文化区	
时 代	分 区	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区		黄土高原大文化区			
		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区		南区	北区		
仰韶 前期	裴李岗时期	第一中原期		南区		兴隆洼文化 赵宝沟文化 红山文化 小河沿文化	
	最早期 半坡期 庙底沟期	第二中原期					
		第三中原期		南区	第一北方期		
		第四中原期		第一 黄 土 高 原 期			
仰韶 后期	秦王寨期	第四中原期		南区	第二北方期		
	庙底沟二期						
龙山时期		第五中原期		第二 黄 土 高 原 期			
二里头时期		第六中原期		第三 黄 土 高 原 期（第三北方期）			
商代	前期	第七中原期		第四北方期			第七中原期
	后期						
西周	前期	第八中原期		第五北方期			第八 中原期
	后期						
东周	春秋	第九中原期		第六北方期		第九中原期	
	战国						
秦代至北宋		第十中原期（中原农业帝国）				北方游牧部族群或农牧王朝	

说明：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区的范围大致是豫中豫东南地区。黄土高原大文化区分南北两个区域，南区的范围大致是关中西和晋中南地区，北区的范围大致是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和晋中北地区。燕山南北文化区的范围大致是内蒙古东南部、辽西和冀北地区。

1. 约公元前 6000 ~ 前 5000 年，裴李岗时期：中原胚胎的孕育

目前为止，公元前 6000 年以前的考古遗存目前发现的还非常有限。大致在公元前 6000 ~ 前 5000 年前期间，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四大系统五支文化：燕山南北地区以筒形罐为特征的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地区以直腹盆（孟）为特征的北福地一期文化和磁山文化（宏观属于燕山南北系统）、山东地区以釜为特征的后李文化、豫中豫东南地区以鼎钵壶为特征的裴李岗文化、渭河关中地区以钵罐为特征的老官台—白家文化。

尽管有人指出白家文化应是裴李岗文化向西发展的结果^①，但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豫西地区的渑池班村一期遗存，与大致同时期的裴李岗文化似乎也有相当的区别^②。因此，这一时期的关中、豫中豫东南似乎分属于两个系统，但其中豫中豫东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无疑是最突出的。裴李岗文化除了向西拓展外，还向北发展与北福地一期文化碰撞结合后形成了磁山文化^③，并还有可能是泰沂地区下一阶段的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④，另外还可能南下参与了下王岗一期文化的形成^⑤。因此，如果将以鼎钵壶罐为特征的裴李岗文化，视作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代表性文化，那么豫中豫东南地区则是核心文化地区，而中原文化区的胚胎孕育即在这一地域。换言之，中原的核心地域最初出现在黄土高原东南缘地区的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亦即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到颍河上游的邻近地区。是为第一中原文化区时期。

2. 约公元前 5000 ~ 前 4700 年，仰韶最早期：中原胚胎的初现

大约从公元前 5000 年开始，黄河流域进入仰韶时代，这一时代考古学文化繁荣的中心，逐渐从黄土高原东南缘区移至南区，并拓展至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成为吸引周边文化向心凝聚的汇集区。

约公元前 5000 ~ 前 4700 年，分布于黄土高原南区和东南缘区的考古学文化，发生

① 袁广阔：《关于裴李岗文化一支西迁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1994 年第 3 期；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第 45 页，文物出版社，2008 年。

② 张居中：《试论班村遗址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 年。

③ 段宏振、张渭莲：《北福地与磁山——公元前 6000 ~ 前 5000 年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格局》，《文物》2006 年第 9 期。

④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⑤ 栾丰实：《试论后李文化》，《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年。

了一个明显的大致同步现象^①。这一时期, 关中地区的零口类型^②, 豫西晋南地区的枣园一期和东关一期早段遗存^③, 豫中豫东南的石固五期^④、大河村前三期和前二期早段^⑤, 伏牛山南麓南阳盆地的下王岗仰韶一期等^⑥, 陶器群构成基本相似: 以红顶钵、弦纹罐、小口壶、锥足鼎等为主要内容。其中略有差异的是, 豫中地区多见一种双耳罐, 大概是直接上承裴李岗文化而来。此时的黄土高原南区和其东南边缘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 以鼎钵壶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特征明显,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动因有

① 关于这一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区间及性质的认识, 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1992年, 笔者曾将太行山东麓地区晚于磁山、早于后岗一期的所谓前仰韶遗存单列出来, 主要遗存有镇江营一期、北福地一期甲类、石北口早期和下潘汪早期等, 主要文化特征是有釜无鼎无彩陶, 称之为北福地文化(参见段宏振:《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新认识》,《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2003年, 北福地遗址正式发掘澄清一期甲类乙类的关系后, 笔者又将北福地文化改称之为北福地二期文化(参见段宏振、张渭莲:《北福地与磁山——公元前6000~前5000年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格局》,《文物》2006年第9期)。北福地二期文化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当于孙祖初所说的是新石器中期向晚期过渡时期的早期。孙祖初将赵宝沟文化、下潘汪文化、北辛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等视作前尖底瓶遗存, 最初认为这个时期的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间, 后来又调整为公元前5000~前4500年之间, 而将半坡类型的最早年代定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参见孙祖初:《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参考碳-14年代数据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本文暂将这一时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5000~前4700年之间, 以待今后更多考古发现数据校正。

目前关于这一阶段文化遗存的地域划分及命名, 更是复杂多样, 计有: 北首岭文化、零口类型或文化、东关文化、枣园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镇江营一期文化、下潘汪文化、北辛文化、北福地二期文化等等。以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 黄土高原东缘的太行山东麓地区以镇江营一期、北福地二期、石北口早期等为代表的有釜钵壶罐而无鼎无彩陶的文化遗存, 比较整合归一, 基本属于东方系统, 是后岗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而黄土高原南区及南缘的关中东、晋南、豫西、豫中以及豫西南地区文化遗存则相对比较整合, 主要文化特征是鼎钵壶罐, 基本属于豫中中原系统。然而有趣的是, 紧接的后一个阶段(半坡期), 太行山东麓地区很快即转入鼎钵壶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后岗一期文化), 而在黄土高原南区及南缘地区, 鼎的范围由西向东急剧收缩而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区, 代之而起的是尖底瓶的分布由西向东逐渐延伸。由此看来, 大约公元前5000~前4700年期间, 黄土高原腹地及其边缘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大致相似的同步时代, 流行鼎钵壶罐(东缘地区流行釜, 并主要受东面山东系统的影响)。这个体系大概应是豫中裴李岗文化鼎钵壶罐传统的后续, 因此可以视作中原文化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拓展期。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零口村》, 三秦出版社, 2004年。

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枣园》,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4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古城东关》,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⑤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 文物出版社, 1989年。

可能是来自豫中地区或甚至更远的东方^①。总之，此时中原的范围远比上一个阶段向西拓展扩大了，几乎扩展至整个的黄土高原南区，南至伏牛山南麓的汉水流域。是为第二中原文化区时期。

另外，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北福地二期文化^②，也以红顶钵、弦纹罐、小口壶等为主要特征，不同的是还包含有大量的釜，这一点与北辛一期文化有相似之处^③。但这一支文化不久即由釜发展为釜形鼎，演变为后岗一期文化。此表明这一时期整个黄土高原及其边缘地区在文化发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较大范围的一致性，为后来的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 约公元前 4700 ~ 前 4000 年，仰韶早期：中原胚胎的重组

约公元前 4700 ~ 前 4000 年，关中地区以尖底瓶彩陶钵为特征的半坡类型自始至终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向东发展成为晋南豫西地区的东庄类型^④，作为东方文化的东关一期遗存开始淡出这一区域^⑤。关中地区文化的强势东扩，形成以渭河、汾河与黄河汇集地带为中心的尖底瓶彩陶钵文化繁荣区，亦即关中豫西晋南文化区。至此，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南区进入了一个繁荣期。

豫中地区的大河村前二期晚段和前一期遗存，陶器群内容主要是：足根有指甲或捺窝纹的釜形鼎、弦纹罐、双耳罐、小口壶、红顶钵、泥突缸、豆及彩陶钵等，既有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枣园》，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年；王月前：《东关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7 年第 2 期。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 年。

③ 关于北辛文化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纵向的长跨度认识，将北辛遗址、大汶口遗址第 7 ~ 5 层（1974 ~ 1978 年发掘）、王因 5 层等遗存，均纳入北辛文化范畴，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 5000 ~ 前 4000 年（参见郑笑梅：《试谈北辛文化及其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 年；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另一种认识虽然纵向范围较窄，但横向的分布西延至太行山东麓一线（参见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 年第 3 期）。本文倾向于认为：在泰沂地区，以北辛遗址早期遗存为代表的北辛一期文化，陶器群主体为釜钵，年代约在公元前 5000 ~ 前 4700 年，是与北福地二期文化年代相当、东西相邻并且文化内涵存在许多近似之处的亲属文化。以北辛遗址中晚期遗存为代表的北辛二期文化，陶器群主体为鼎钵壶，年代约在公元前 4700 ~ 前 4000 年，是与后岗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东西相邻并且文化内涵存在许多近似之处的亲属文化（参见段宏振：《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新认识》，《文物春秋》1992 年第 3 期；段宏振、张渭莲：《北福地与磁山——公元前 6000 ~ 前 5000 年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格局》，《文物》2006 年第 9 期）。

④ 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均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⑤ 王月前：《东关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7 年第 2 期。

与北面后岗一期相似的较多因素,又有与西面东庄类型相似的少量因素。因此产生了将大河村前二期和前一期归入后岗一期系统的看法^①,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将其划入下王岗类型^②。

豫中豫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面临西面和北面两个方向的压力,自身传统特色受到冲击,但发展脉络并没有中断。上一阶段的中原文化区发生分化,豫中地区在豫西晋南的影响力开始后撤。在这一过程中,关中豫西晋南地区和豫中地区的文化面貌,变得渐行渐远,原来的中原区内部进行了重组。如何看待这个变化,大致有两个观察角度:

其一,如果我们注重历史传统基础,则可以将以大河村前二期、前一期为代表的鼎钵遗存,视作中原文化区的传承文化,而豫中地区即为中原区的核心地域,是为第三中原文化区时期。

其二,如果我们注重历史的新兴力量和发展趋势,则也可以将半坡东庄类型的尖底瓶钵遗存视作中原文化区的新生文化代表,而关中豫西晋南地区就成了中原区的核心地区,亦即中原文化区的核心向西发生了偏移。

但是,如果我们放眼黄土高原大文化区,则还是以第一种角度似乎为宜。第三中原文化区较前一阶段向东有所收缩,黄土高原南区的独特性开始显现。

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作前一阶段中原系统的鼎钵壶罐文化的后裔,但其本质属性及渊源与东方系统还有着密切的关联^③。后岗一期文化向北积极拓展,在阴山以南地区发展为当地的石虎山Ⅰ遗存,而稍早阶段的石虎山Ⅱ遗存可能就要追溯到北福地二期文化的北进^④。相比之下,半坡—东庄类型的向北

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② 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第1期。

③ 关于后岗一期文化的性质及分布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著名的观点将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围,扩大为以华北平原为中心及其两翼的汾河谷地到河套和山东半岛,南达郑州地区(参见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陈光:《试论后岗一期文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本文认为北福地二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属于一支釜(后为鼎)钵壶罐文化。北福地二期文化的形成,可能是后李文化西进和裴李岗文化北上的共同结果。北福地二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分布的核心地域,主要在太行山东麓南北一线,属于西部黄土高原和东方泰沂两个地区之间夹缝地带的一种走廊文化,但其本质属性应介于山东东方系统与豫中中原系统之间。换言之,北福地二期—后岗一期文化的鼎钵壶罐,介于北辛—大汶口文化的鼎钵壶鬲豆杯和石固五期—大河村前三至前一期文化的鼎钵壶罐两个系统之间,是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太行山东麓地区本地特色的北福地二期—后岗一期文化的釜鼎钵壶罐文化。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虎山遗址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扩张可能要稍晚一步,它们在阴山以南地区形成鲁家坡一期遗存^①。黄土高原东缘区和南区的文化分别相继北上拓展,在阴山南麓地区形成当地的文化,从而使整个黄土高原的文化逐渐呈现一统整合的趋势。虽然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表明当地是否早已经存在原始农业,但作为发达农业文化的半坡和后岗一期文化北上,将先进的农业移植到阴山以南地区当无问题。至此,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北区出现了,即北方文化区的萌芽,甚至可以称之为第一北方文化区时期,是其产生的动因大致是南部农业文化北上的结果。

4. 约公元前 4000 ~ 前 3500 年, 庙底沟时期: 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繁荣

约公元前 4000 ~ 前 3500 年,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这是一个顶峰的整合期,气候环境适宜,黄土高原区域内的文化发展趋于统一并向四方扩展,尖底瓶和花瓣形图案彩陶成为标志器。这一整合过程的动力,是上一阶段关中晋南豫西的黄土高原南区文化发展强势的继续,向东至豫中地区发展成为以大河村一、二期为代表的阎村类型^②,向北至阴山以南地区发展成为白泥窑子类型。

黄土高原南区亦即黄土高原的南缘河谷地带,大致以渭河、汾河、洛河、伊河与黄河汇集地带为中心,是文化繁荣的核心地域。此时不仅豫中已与豫西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整个黄土高原的南区和北区几乎整合为一个文化区。这种态势下原来的中原文化区,既可理解为中原披着黄土高原区的大外衣,也可以理解为黄土高原大区涵盖收纳了中原区。是为第一黄土高原大文化区时期。

此时,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积极向外施加影响,庙底沟类型彩陶广泛四传,在黄土高原之外的地域成为当地的庙底沟式彩陶,几乎波及整个黄河流域,南至长江沿岸^③。庙底沟类型对四方的辐射力远远超越周边的微弱反影响,因此黄土高原成为黄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中心。此时,黄土高原的庙底沟类型、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都是各地的区域文化中心,但其中似乎庙底沟的位置更凸显一些。庙底沟类型在冀西北与红山文化发生了接触与交流。红山的突出内容主要是坛庙冢及精美的玉器,可能属于一种发达的祭祀文化。或许中原以后也会发现类似的祭祀遗存,或许中原的发达没有过多地集中在这一层面。

第一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形成,得力于南区文化的强势发展和辐射,不仅覆盖了北区的文化,而且还涵盖了东南缘地区上一阶段第三中原区的文化。但此时的中原并

①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②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袁广阔:《阎村类型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

③ 段宏振:《试论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传播》,《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

没有中断和消亡,而是在涵盖之下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继续发展。豫中地区的阎村类型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多用鼎,尖底瓶瘦长,彩陶的色调与图案均丰富多彩,还有独特的葬具伊川缸等^①。这说明中原文化区不仅在黄土高原大区之中个性凸显,即使与邻近的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相比,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5. 约公元前 3500 ~ 前 2500 年,仰韶后期:中原胚胎的重现

(1) 约公元前 3500 ~ 前 3000 年,仰韶后期早段的秦王寨期阶段

前一时期的文化大整合开始消解,各地的文化个性逐渐彰显: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东关遗存,豫中以大河村三期至四期早段为代表的秦王寨类型或文化^②,晋中的白燕一期类型^③,太行山东麓地区南部的大司空类型。

晋南东关四期遗存陶器群的主要内容为:尖底瓶、罐、瓮、鼎、曲腹钵及彩陶钵等,既与关中地区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又明显含有不少豫中地区的因素。

豫中地区大河村三期和四期早段陶器群的主要内容为:鼎、罐、瓮、缸、曲腹钵、豆及彩陶钵、罐,与晋南豫西的区别比较明显,显示着被覆盖的中原文化区逐渐回归重现。秦王寨类型这种鲜明的独特性,以至于有人认为其已基本从仰韶文化中脱胎出来了,应属于仰韶和大汶口两大文化之间的亚文化^④。中原文化区的此次重现,自此以后再没有经历覆盖。是为第四中原文化区时期,

太行山东麓地区南部的大司空类型,陶器群以平底器为主,此与秦王寨类型形成区别。但两者的彩陶存在着不少的相似性,显示了中原区向北方的影响。至于太行山东麓地区北部以午方、东牛等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文化面貌显示出许多有别于大司空类型的地方特色,如刮条纹筒形罐、舌状或柱状钵等,反映了北方文化向南方的渗透。

阴山以南地区为海生不浪类型或文化,又叫庙子沟文化,存在较多的细石器,狩猎比重较前期增加,农业经济开始发生减弱。文化面貌与经济类型均开始走向与黄土高原南区分离的道路,自身的独立性已经开始凸显。

北方区的东缘地区开始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联系密切。燕山南侧的午方、姜家梁、雪山一期等遗存,与燕山北侧的小河沿文化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有人整合为雪山一期文化^⑤。

(2) 约公元前 3000 ~ 前 2500 年,仰韶后期晚段的庙底沟二期阶段

各地文化在个性发扬的同时,又在孕育着一个新的文化整合期。关中地区的泉护

① 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

② 孙祖初:《秦王寨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③ 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

④ 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⑤ 韩建业:《论雪山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二期类型，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晋中的白燕二期类型，豫中的谷水河类型^①。

关中与豫西晋南地区虽然继续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但此时晋南地区的文化特性似乎更为凸显一些。以晋南地区的东关五期为例，典型陶器有：鼎、罍、釜灶、高领罐、深腹罐、双釜盆、刻槽盆等，篮纹比例较高。

豫中豫东南地区，以大河村四期晚段和五期为例，主要陶器有：鼎、深腹罐、盆、豆、杯等，缺乏罍、釜灶、箍状堆纹罐、刻槽盆等代表性的西部因素，反而含有不少大汶口和屈家岭等东方或南方的因素。豫中地区此时大概受到来自四面的文化冲击，其中来自西面的影响逐渐增强，如二里头 1978 年发现的 H1，出土一组典型的庙底沟二期陶器^②；登封告成北沟 H1（后改为 H29），出土具有庙底沟二期和大汶口文化合流特色的陶器（鼎罐罍豆刻槽盆）^③；而在豫东地区，东进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当地的大汶口文化合流形成一种特殊的遗存段寨类型^④。这一时期除了末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第四中原文化区的范围可能有所收缩，文化发展也暂时处于相对内敛沉寂的状态，但仍就继续保持着传统的延续。

阴山以南地区为阿善三期类型或文化，细石器继续增多，还有一定数量的篦纹陶。自身独特性继续增强，是黄土高原北区的发展延续。

在整个仰韶后期，原来的黄土高原大文化区进入分化的中间期，不仅北区和南区的独特性恢复显现并有显著发展，而且东南缘地区的中原区也得到重现。是为第四中原文化区和第二北方文化区时期。同时，黄土高原辐射四方的力量逐渐减弱，而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不断增强，尤其是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更加突出^⑤，故此甚至有人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形成与大汶口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⑥。中原和北区开始慢慢脱下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外衣，逐渐回归和重现本来的传统基础。

6. 约公元前 2500 ~ 前 2000 年，龙山时代：黄土高原大文化区的再次繁荣和中原胚胎的凸显与稳固

约公元前 2500 ~ 前 2000 年，龙山时代。各地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整合时期：关中大

①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考古》1982 年第 5 期。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告成北沟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 205 ~ 210 页，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④ 段宏振、张翠莲：《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1 年第 2 期。

⑤ 可参阅：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 年第 2 期；杨育彬：《试论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与屈家岭文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⑥ 卜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 年第 2 期。

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晋南的陶寺类型,豫西的三里桥类型,豫中的王湾三期文化,太行山东麓的后岗二期文化,豫东的造律台类型。这些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和同步性,因而被纳入中原龙山文化系统^①。但是,它们深层内涵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如果以典型陶器鬲的有无和多少来观察:客省庄二期、陶寺比较接近,鬲的比重较高,基本属于鬲文化,其中前者主要为单把鬲,后者主要为双鬲;后岗二期、造律台比较接近,前者虽然存在少量鬲,但基本都仍属于平底罐瓮和甗文化;王湾三期总体上更接近于后岗二期和造律台,属于平底罐瓮和鼎文化。阴山以南到晋中地区的老虎山—游邀文化^②,属于一种鬲甗(双鬲和甗)文化,与陶寺更为接近。如此,黄河中游流域的龙山遗存似可分为两个宏观系统:黄土高原地区的鬲文化系统(包括双鬲和单把鬲),黄土高原东缘和东南缘地区的平底罐瓮文化系统^③。

如何认识这两个系统?对于黄土高原来说,应是继庙底沟整合期之后的又一次文化整合,但此次整合的标志器是鬲。以两种基本类型的鬲类为特征的龙山遗存,基本控制了黄土高原地区,并强烈向四边辐射影响。而以罐瓮甗(后岗二期)和罐瓮鼎(王湾三期)为特征的龙山遗存,则基本控制了黄土高原东缘平原和东南缘丘陵平原。是为第二黄土高原大文化区时期,上一阶段的北区则被覆盖在其下,唯有中原区置身之外,因此黄土高原文化区第二期的范围要比第一期时缩小了许多。

关于鬲的发生轨迹和发源地存在着不同的认识^④。或是甗—甗式鬲—鬲,或是釜灶—鬲,抑或是两种途径并行甚至还有其它途径。鬲究竟具体源于晋南、晋中,还是晋北?或者单把鬲系统源于晋南或关中,双鬲系统源于晋北?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鬲源于黄土高原腹地当无多大问题。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区是鬲的繁荣核心地域,高原东缘山前平原和东南缘丘陵平原地区则是鬲的次一级分布区,含有一定数量的鬲。而东缘地区太行山东麓鬲的比重,似乎又要高于东南缘地区的豫中地区。

豫中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虽有少量的袋足器甗及鬲,但主要典型陶器是平

①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许永杰、卜工:《三北地区龙山文化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1期;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③ 段宏振:《试论华北平原龙山文化》,《河北省考古文集》(第一集),东方出版社,1999年。

④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许永杰、卜工:《三北地区龙山文化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1期;高天麟:《黄河流域龙山时代陶鬲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张忠培:《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严文明:《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有关问题》,《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